

社会与思想丛书

# 开放 社会科学

&

华勒斯坦 等著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98972

S

开放社会科学

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

&

华勒斯坦

儒玛

凯勒

柯卡

勒古尔

姆丁贝

武者小路

普里果金

泰勒

特鲁伊洛 著

刘 锋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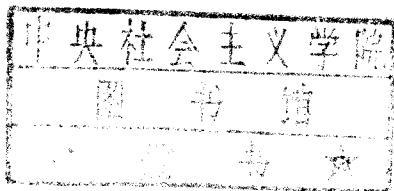


\*200115865\*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天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华勒斯坦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

(社会与思想丛书)

ISBN 7-108-00999-0

I.开… II.华… III.社会科学-研究 IV.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4122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875

**字 数** 7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6.40 元

12/10/67

---

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成员  
MEMBERS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委员会主席, 社会学, 美国。现任宾厄姆顿大学  
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学教授。

**儒玛** Calestous Juma

科学技术研究, 肯尼亚。现任非洲技术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凯勒** Everlyn Fox Keller

物理学, 美国。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与科学  
哲学教授。

**柯卡** Jürgen Kocka

历史学, 德国。现任柏林自由大学工业世界史教  
授, 柏林科学学院终身研究员, 波茨坦现代史研  
究中心主任。

**勒古尔** Dominique Lecourt

哲学,法国。现任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教授。

**姆丁贝** Valentin Y. Mudimbe

拉丁系语言,扎伊尔。现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法语和意大利语凯南讲座教授,北美非洲哲学学会秘书长。

**武者小路** Kinhide Mushakoji

政治学,日本。现任明治学院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

**普里果金** Ilya Prigogine

化学,比利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现任国际物理和化学研究所所长,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普里果金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主任。

**泰勒** Peter J. Taylor

地理学,英国。现任纽卡斯尔大学政治地理学教授。

**特鲁伊洛** Michel - Rolph Trouillot

人类学,海地。现任霍普金斯大学文化、权力和历史综合研究所所长,人类学教授。

## 前 言

古本根基金会(The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在八十年代后半期曾经主持过一个研究项目,以后成为“2000年的葡萄牙”(Portugal 2000)计划的富于成果的第一阶段。这个研究项目的重点在于探讨葡萄牙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些可能的发展轨道,并对这些发展轨道的框架以及所牵涉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思考。这些思考和研究成果已经作为“葡萄牙:下一个二十年”(Portugal - The Next Twenty Years)丛书的一种以葡萄牙文出版。

随着这一富于首创性的计划的开展,基金会还设法提供一定的资金来组织有关的学者对某些全球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社会的一个共同目标在于寻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探讨和解决其中所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对这一社会共同目标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也在基金会的资助之列。有鉴于此,从不同学科

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视角出发对社会科学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一番考察，实在是恰当的。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已导致了对生活的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于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大学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

换句话说，如何打破现有的学科结构，这是否应该被看成是社会科学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上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境呢？

有鉴于此，古本根基金会采纳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布罗代尔研究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主任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教授的建议，组织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其中六位来自于社会科学，两位来自于自然科学，两位来自于人文科学——共同从事一项研究计划，其宗旨是要对社会科学的目前状况和未来前景进行思考。

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创立于1993年6月，由华勒斯坦教授担任主席，其组成方式反映出欲取得如下报告中的分析结果而必需的深度和宽广的

视野。

《开放社会科学》内容严肃、丰富和富于挑战性，它忠实地反映出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创立后两年间的紧张而愉快的艰苦工作。委员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于1994年6月在里斯本基金会总部召开，第二次于1995年1月在巴黎的人文研究院召开，第三次于1995年4月在宾厄姆顿的布罗代尔研究中心召开。

《开放社会科学》一书所达到的学术水准，自然应归功于在委员会工作的各位才华杰出的学者。但是，倘若没有华勒斯坦的热忱、决断和以主席身份所做的领导工作，本书所取得的全部成就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此谨表谢意。

古本根基金会



# 目 录

前 言	古本根基金会	1
第一章 从十八世纪到 1945 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1
第二章 1945 年至今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		35
一、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		39
二、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		52
三、区分“两种文化”是否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		64
第三章 我们现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		75
一、人与自然		84
二、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		87
三、普遍与特殊		92
四、客观性		96
第四章 结语 重建社会科学		101

## 第一章

# 从十八世纪到 1945 年 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独立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根”。\*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

\* Preface to Charles Morazé, *Les bourgeois conquérant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7.



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普通的宗教文献探讨这类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文献同样也探讨这类问题。除此而外,还有各种世代相沿的口传智慧,它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获得书面定型。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世界上的这一或那一地区的丰富而漫长的人类生活经验中归纳筛选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知识被称为 *scientia*, 意为“知识”。当然,从语源学上讲,哲学的本义也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知”。

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牛顿模式,认定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如同上帝一样,我们也能够达致确实性;既然万物共存于永恒的现

在,因此我们不必区分过去和未来。第二个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它假定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曾于1663年为皇家学会草拟了一份章程,他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sup>①</sup>这些章程业已体现出,认识方式分化成了斯诺(C. P. Snow)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

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亚历山大·柯伊雷(Alexandre Koyré)在梳理了自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空间概念的转变后指出:

新宇宙论所设定的无限宇宙在空间广延和时间绵延两方面都是无限的,其间永恒的物质依照永恒而必然的法则无止境、无目标地运动着。这个无限宇宙秉承了神的一切本体论属性,不过也仅仅秉承了这样一些属性,其余的都被远遁的上帝随携而去了。<sup>②</sup>

---

<sup>①</sup> 引自 Sir Henry Lyon, *The Royal Society, 1660 - 1940*,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41.

<sup>②</sup> Alexandre Koyré,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76.

自然,远遁的上帝其他属性包括基督教世界所尊崇的种种道德价值,如爱、谦卑和仁慈。在此,柯伊雷对于取代它们的那些价值未置一言,但我们知道,远遁的上帝所留下的并不完全是一个道德真空。如果说天空被推展到极限以外,人类的野心又何尝不是如此。进步成为一个操作性的语汇,它现在被赋予了一种新近获得的对于无限性的意识,并且随着物质成就的不断取得而大大强化了。

柯伊雷所说的“世界”并不是指地球,而是指宇宙。的确,可以认为,在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对于地球空间的感性认识正发生一个逆向的转折,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空间的有限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伴随着横越地球的探险航行,地球才逐渐地围绕着它的球形结构收拢。诚然,这个球体的圆周比哥伦布(Columbus)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然而它却是有限的。通过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并且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同一些探险航行还进一步开拓了商业通道,结果造成劳动分工的扩大,而在以后的岁月里,社会距离和时间距离都将随之而不断地缩小。

然而,地球的这种有限性不是,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尽管无限进步的理想和景观要以时空的无限性作为支撑,但是,能否通过技术上的进展在人类事物中不断地臻于进步,那要取决于能否认识和探索世界,取决于是否在某些关键的方面(尤其是在认识论和地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有限性怀有信心。的确,按照当时的一般假定,我们若欲取得进步,就必得彻底消除我们作为发现者所

受到的一切阻碍和限制,使自己能够自由地去揭示各种内在的秘密,发掘可触及的世界里的各种资源。迄至二十世纪,地球空间的有限性似乎主要地有助于推动西方人按照进步的要求去从事探险和开发活动,赋予他们的统治欲望以切实的可行性。在二十世纪,随着地球的空间距离缩小到一个似乎带有束缚性的水平上,地球空间的有限性甚至可以用来提供一个新的刺激,促使人们把探索的触角日益广泛地向上向外伸张,从而更进一步地扩大统治的范围。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栖身之所看上去与其说像一个根据地,倒不如说像一座发射场,从这里,我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男人(以及少数几个女性)可以拔地而起,在太空中翱翔,确立自己对越来越广大的宇宙一体性的支配地位。

进步和发现或许是此处的关键词,不过,为了获得一套完整的词汇,我们还需要另外再加进几个词,如科学、统一性、单纯性、支配甚至“宇宙”。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并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者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视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以前,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它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而开始着上一层等

级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是如此: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词主要地(而且经常是唯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sup>①</sup>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

科学(science),亦即自然科学的性质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相形之下,与之对应的那种知识形式就不那么明确了,人们甚至在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上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它有时被称为文科(arts),有时被称为人文科学(humanities),有时被称为文学或美文学(belles-lettres),有时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有时甚至被简单地称为“文化”,而在德文中则被称为 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性,致使该领域的从业者无法就其学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辩解,更无法结成统一的联盟,因为他们似乎根本

---

<sup>①</sup> 这一点在英语和拉丁系语言中非常明确,但在德语中就不那么明确了。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一词仍然被当作一个表示系统知识的一般性术语来使用。英语中称为“humanities”(人文科学)的那一类学科在德语中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直译过来就是“关于精神或心灵问题的知识”。



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实际的”成果。围绕着何谓有效知识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其焦点不再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迄至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赢得了对这个领域的独占权),而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的知识。

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了一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欧洲的思想家们也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体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波斯人?”),对其形态各异的特色应当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自十六世纪以来,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濒于消亡的机构,这是由于它原先与教会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结果)在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

大学经历了一次复兴和改造。神学院变得无足轻重,有时甚至被完全取消了,或者被哲学院里的一个小小的宗教学系所取代。医学院保持了它原有的职能,继续成为一个特定专业的训练中心,而该专业现在已经完全被界定为一种应用型科学知识了。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法学院里)确立起来的。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

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